

**2、系统。**丛书的主题是大陆学者对中国宗教的言说，其中不仅有对宗教学基本原理的阐发，也有对中国五大宗教的阐释，还有对中国民间宗教以及原始宗教等的解读。而且，选取的成果从地区分布上涵盖大陆各主要宗教学术机构；从时间上涵盖建国以来的各个时期，重点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学术成果。因此，可以说，本丛书较为系统全面地展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大陆宗教学研究的成果。

**3、创新。**丛书邀请的学者来自全国各地，且老、中、青结合，他们自己精选自己的文章，选择的标准和重心自然具有了多样性，从而使本丛书比以往完全由主编圈定或者由少数人按预定模式编辑的文集展示出更加丰富的视角和内涵。每篇作品内容上各有侧重，但都提供了重要的观点、思路和信息。此外，为便于读者阅读和检索，每篇文章都加入了内容提要 and 关键词，也算是文集在编辑方式上的一次尝试。

当然，本丛书既然是文集，所论问题自然无法有学术专著那样的系统和详密，尤其在作者人选上不能周全，而多数作者又只能提供一篇论文，故难以将宗教学在中国发展的全貌展示得淋漓尽致，这是我们深感遗憾的。另外，个别已经故去前辈的作品，在编辑过程中保持了文章的全貌。最后，在注释、体例等方面，尽管编者做了很多努力，但部分作品为多年前的旧作，有些缺憾实难弥补。

然而，一个理念的实现需要一个过程，越是完美的理念越需历经坎坷。诚如路要一步一步地走，第一步在整个旅程中最短、最艰辛，但却最为可贵。我们相信，很多朋友都有推进学术发展、造福社会的美好愿望，唯愿我们今天的努力是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促进中西文化交流的一块路石。

（作者刘海涛，民族出版社编审。）

## 评何孝荣博士新著《明代北京佛教寺院修建研究》

濮文起

近读南开大学何孝荣博士新著《明代北京佛教寺院修建研究》（上、下册，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年12月），获益匪浅，感慨良多。掩卷沉思，我认为这是一部可以传世的著作。原因有三：

**一、填补空白。**1980年代以来的中国佛教学术研究空前活跃，举凡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佛教经典的传译与阐释、佛教思想与中国传统思想的冲突与融合、佛教义学与宗派佛学的内容与成就、佛教领袖人物的思想与活动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分别以论文和专著的形式接连发表和出版，丰富了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但是，佛教寺院——僧团寄居、修道、弘法的场所和活动的基地——修建方面的学术研究，却很少有人问津。何孝荣博士以一个朝代——明朝，以永乐以来的明朝首都——北京的佛教寺院为个案，对其修建历史进行了认真地考察和缜密地研究，最终以洋洋75万字的精品大作——《明代北京佛教寺院修建研究》，为人们展示了一幅明代北京佛教寺院的宏伟画卷。以我的孤陋寡闻，这是目前国内外学术界第一部系统阐述明代北京佛教寺院修建历史的专门著作，它的问世，不仅填补了佛教史研究的空白，而且填补了明史研究的空白，乃至填补了中国古代建筑史和一般文化

史研究的空白，其学术价值与历史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二、既专又精。著名佛教学术研究专家孙昌武先生在为何孝荣博士撰写的《明代北京佛教寺院修建研究·序》中说：“在学术研究中，专业性乃是学术性的前提，也是它的标志。”何孝荣博士正是在牢牢把握学术研究的专业性这一点上，在史料钩沉、史实抉原，并由此在学术创新方面做出了许多令人信服的骄人成绩。

在史料钩沉方面，何孝荣博士不仅从明朝正史、野史、方志、佛寺志、《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51至60册）中，摘录相关史料，而且以“京城”、“京师”等40个关键词，对《四库全书》、《四部丛刊》，以及中国基本古籍库所录万余种古籍中进行全文检索，搜集相关史料。又浏览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续修四库全书》、《四库禁毁书丛刊》等所收明人文集，搜寻相关碑记、游记、序文等。与此同时，何孝荣博士还采用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多次前往北京，实地考察了智化寺、广济寺、妙应寺、护国寺、大慧寺、法源寺、报国寺、天宁寺、真觉寺、万寿寺、慈寿寺、大觉寺等佛教寺院，从中获取了不少碑刻等实物史料。

在史实抉原方面，何孝荣博士并不满足于已经占有的大量史料，而是对其中的重要部分进行考证抉原。如大功德寺，明代的《长安客话》、《帝京景物略》等北京志书，均称该寺为“木球使者”板庵大觉禅师宣德二年募建。何孝荣博士根据《大明宣宗皇帝御制集》和明人王直《抑庵文后集》中的有关史料，考证出该寺实为宣德四年（1429）孙皇后重建，板庵或许只是起了募缘鼓动作用（见该著第176—177页）。又如与皇姑寺（又名顺天保明寺）密切相关的吕尼，明代著名史学家谈迁所著《枣林杂俎》和明人沈榜所著《宛署杂记》以及清雍正《陕西通志》等志书，均称吕尼在谏诤英宗北征时，被英宗命武士捶死。近人李世瑜在其论文《顺天保明寺考》（《北京史苑》第3辑，北京出版社，1986年）中，估计吕尼当时可能被下狱，而何孝荣博士则依据《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中的嘉靖年间所立《明故顺天保明尼姑院尼师第二代住持金西白杨氏墓志铭》，发现天顺三年（1459），尼僧妙金拜吕尼为师，“则吕尼并未死于正统十四年（1449），此说可为李世瑜的估计提供佐证”（见《明代北京佛教寺院修建研究》第513页注释①）。

在学术创新方面，何孝荣博士通过对明代北京佛教寺院修建历史的深入研究，不仅揭示了明代帝王、后妃、宦官、僧俗各色人等崇佛心理及佛教信仰实态，而且提出了一种新的学术观点：“明代佛学虽然衰微不振，但是佛教传播却广泛深入，佛教日益世俗化，与百姓生活紧密联系，从教理的佛教走向信仰的佛教，从僧侣的佛教走向庶民的佛教。瑜伽教僧占僧团的半壁江山、民众大量出家，佛教维持着表面的繁盛，都是其明显的表现。而民众大量修建佛教寺院，也是佛教日益世俗化、与百姓生活紧密联系的一个必然结果和突出表现”（见《明代北京佛教寺院修建研究》第739—740页）。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何孝荣博士通过梳理占有史料和研究发现的新史料，敢于突破成说，推倒己见，提出新的学术观点。如传统观点认为，明朝禁止私创佛教寺院，明代佛教寺院多是对前代佛教寺院的重建和重修。何孝荣博士通过对占有史料的梳理，以明代北京佛教寺院修建情况为例，明确指出在明代北京修建的佛教寺院中，“新建者三百一十四所，重建者一百七十一所，重修者二百二十八所，即使不计重建、重修中有重复者，新建者起码占到有明确修建年份佛教寺院总数七百一十三所的44%，占到北京佛教寺院总数（不包括宫城、皇城中的佛寺、准佛寺）七百八十所的40%。这一比例，使我们原来关于明代禁止私创佛教寺院、明代佛教寺院多是对前代佛教寺院的重建和重修的看法，需要加以修

正”(见《明代北京佛教寺院修建研究》第680页)。

此外,尤其令人称道的是,《明代北京佛教寺院修建研究》引用史料丰厚翔实,注明出处的古今文献达五百种之多,真正做到了博览群书,由博返约;同时也真正达到了傅斯年先生所说的“有一分资料,说一分话;有十分资料,说十分话;没有资料,就不说话”的治学境界。

1998年夏季,何孝荣博士开始为该项学术研究作准备;2001年春季,该项学术研究获得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批准立项。此后,为了搜集史料,何孝荣博士真可谓“上穷碧落下黄泉”。他常年奔波于京津两地,在图书馆钩沉史料,到北京佛教寺院实地调查,向专家学者虚心请教;还充分利用日本留学和赴香港参加学术研讨会之机,搜集日本、台湾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这种持之以恒的治学精神和勤奋不懈的治学态度,使他所搜集的史料丰厚完备,令人赞佩。在广泛搜集史料的基础上,何孝荣博士经过认真分析,去伪存真、纠偏正误,然后进行考证与研究。从1998年夏季准备该项学术研究,到2007年夏季该项学术研究成果杀青,经历了整整十个春秋,真是“十年磨一剑”。

(作者濮文起,天津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 浅评乐峰先生主编《俄国宗教史》

高 莽

《俄国宗教史》是研究宗教领域的专业书籍,这样的书难免枯燥乏味。但粗读之后,我发现本书很有特色,宗教和人民群众的生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有理论有事实有情趣。

本书介绍的是俄国自公元5—6世纪民族大迁移时期多神教崇拜起,直到当今的俄罗斯宗教政策与宗教的现状。以东正教为主要线索,介绍了天主教、基督新教、犹太教、伊斯兰教、佛教、萨满教及新兴宗教等在俄罗斯有影响的宗教、派别的情况。

作者们掌握俄文,善于运用第一手的原文材料。书中在介绍俄国宗教史的同时,又全面地分析和说明宗教对俄国政治、经济、文化、历史、艺术的影响,以及俄国各宗教流派之间的联系、冲突和互相之间的对立。能够如此全面细致地介绍一个多民族、多宗教、历史悠久的世界级大国的宗教史实属难能可贵。

我认为《俄国宗教史》一书值得推介。

首先,宗教研究牵涉广杂,研究著作难免庞杂无序,但是本书以新颖的方式,全景式的展现了俄罗斯宗教历史,采取的是双重结构。从重要性上分类,将在俄国普及最广、信众最多、影响最大的东正教作为全书主干,而其他宗教、流派作为枝叶。应该说这样的逻辑结构是符合俄罗斯宗教的客观情况的。但是,仅仅凭借前繁后简的树状结构还无法全面阐述一个多民族多教派国家的宗教历史。因此,本书在树状结构之外,又采用了网状结构,说明各种宗教之间的关系。在纵向上,本书以时间线为顺序,将各宗教派别在俄罗斯的引入、发展直至当今的情况进行说明。横向上,本书还将历史中各宗教派别错综复杂的关系拆解开来,阐明了各教派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他们在同时代和俄国政权之间